

史学新论

陈独秀民族国家思想探析

董根明

【提要】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陈独秀的民族国家思想是颇具有先导性、前瞻性和启蒙性的。陈独秀对近代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以及国家与政府关系的认识有自己独到见解。他主张域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不排满。他警惕“日患”，坚定抗战胜利之信心。他认为国家应为人民谋福利，否定“政府即国家”观念。

【关键词】陈独秀 民族 国家 思想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10) 06—0119—06

从参与辛亥革命到创办《新青年》，从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创建中国共产党，从领导大革命到宣传抗战，陈独秀发表了大量涉及民族和国家问题的言论，其思考是深刻的，其影响是久远的。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陈独秀的民族国家思想是颇具先导性、前瞻性和启蒙性的。

一、先导性：主张域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不排满

辛亥革命时期，陈独秀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提倡民主共和，但不排满。在主张域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前提下，陈独秀特别强调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

20世纪初，伴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已经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挽狂澜于既倒，拯国难于水火，这是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在当时，如何救亡，人们的看法又不尽相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然而也有一些革命党人完全

将满清统治等同于“异族”统治，站在大汉族的立场上，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因而极力“排满”。甚至中国同盟会这样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在其创始之时也曾以“驱除鞑虏”号召民众。对此，陈独秀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满族是中华大国里的一员，反封建专制不等于排满，并且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唤起民众，救亡图存。

早在1904年9月，陈独秀就在《安徽俗话报》上撰写《本国大略》一文，指出：“全国人种分为四族，一曰汉族，……一曰通古斯族，人数有五百万，从前住在满州地方，现在的朝廷就是此族。”^①在同年发表的《亡国篇》一文中，他分析道：“我们中国人，不懂得国家和朝廷的分别，历代换了一姓做皇帝，就称做亡国，殊不知一国里，换了一姓做皇帝，这国还是国，并未亡了，这只能称做‘换朝’，不可称做‘亡国’。必定这国让外国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权，被外国占去，这才算是‘亡国’。不但亡国

^① 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和换朝不同，而且亡国还不必换朝。只要这国的土地、权利、主权，被外国占夺去了，也不必要外国人来做皇帝，并且朝廷官吏，依然不换，而国却真是亡了。”^①显然，陈独秀在这里已经运用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中关于国家的理论，把土地、主权和国民看作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从而摒弃了狭隘的大汉族观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陈独秀对同盟会以“排满”号召民众的做法保留了自己的意见。据郭湛波在20世纪30年代所著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介绍，陈独秀“初留学于日本，时中山正组织同盟会，但他首先反对兴汉灭清的狭隘民族主义，未参加。”^②赤光在《陈独秀底生平及其政治主张》一文中也分析道：“其时中山正组织同盟会，主张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兴汉灭清’为口号，他即表示反对，他不赞成这种‘民族残杀政策’。”^③今天，虽然我们不能断言陈独秀没有参加中国同盟会的是与非或利与弊，但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陈独秀对于满族是中华大国里的一员，还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

二十年后，陈独秀在回顾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撰写了《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明确指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排满”。“当时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是对外收回权利（矿山、铁路等），是对内反对中央官有企业（浙路、川路等），革命党人忽略了这种适合国民革命之真实的物质要求，而专事感情的排满运动，当时的党人，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囿于满清虐政之直觉，以为清倒则万事自好而加入革命的党人居最大多数，因此清帝一退位，革命党便失了革命运动的机能，不但首先叛党之章炳麟、刘师培公然宣言只知排满不知共和，大部分革命党人都减少了革命的热忱，即革命的领袖们也真无法解释一般民众‘反对清室退位后继续战争’的谬误心理，因为当时只有排满的呼声占领了全社会。而且在这单调的呼声中，竟将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即反抗外国侵略的呼声掩住了，使帝国主义者安然以巨款援助袁世凯解

散革命的势力。当时党人的理论，未尝不是由推倒满清而革新自强，由革新自强而挽回权利；然而这种转弯的想象，不如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能够号召民众，当时直接鼓动民众革命情绪的只是推倒满清，所以‘满清倒而革命运动即应停止’，在当时民众心理上，竟成了一个合理的逻辑。”^④

事实上，中国同盟会很多会员都具有“兴汉灭清”的思想，如果说辛亥革命的反封建旗帜是很鲜明的，那么，相对而言，辛亥革命的反帝旗帜就比较黯淡，陈独秀的上述见解，特别是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是很切中要害的。虽然这种分析不能说明陈独秀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具有这种深刻的认识，但在当时他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观念，站在包括满族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上，号召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陈独秀认为国家是全国人的大家，人人都有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⑤辛亥时期，陈独秀发起反对沙皇俄国侵占东三省的演说大会，创办《安徽俗话报》，其目的就是开启民智，唤醒民众，从思想文化角度拯救民族的灾难。应该说，陈独秀的这种认识，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很有深度的。它不仅直接表现为五四时期陈独秀启蒙思想之滥觞，而且深刻地影响着陈独秀对民族和国家问题的具体认识。

二、前瞻性：警惕“日患”， 坚定抗战胜利之信心

在中国近代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中，陈

① 陈独秀：《亡国篇》，《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②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③ 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北京东亚书局1933年版，第178页。

④ 陈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页。

⑤ 陈独秀：《说国家》，《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独秀不仅表现出了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而且还经常以启蒙思想家的身份呼唤“国人其速醒”，^①对“日患”尤为警惕。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宣传抗战，认为中国抗战必定取得最后的胜利。

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由陈独秀撰写的文章是1897年的《扬子江形势论略》。陈独秀之所以写这篇纵论长江军事布防的文章以“引领于我国政府”，是因为他痛感“时事日非，不堪设想”，“近时敌馱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覬觐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他对国家面临瓜分的情势深感忧心忡忡，若“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②在这篇长达七千多字的文章中，陈独秀纵论自荆襄至吴淞口的长江形势和战略地位，广征博引历代战争的得失，希望清政府能够加强江防建设，以期有效抵抗列强进一步的侵略。1903年5月17日，安徽爱国人士在安庆藏书楼举行拒俄大会，陈独秀发表《安徽爱国会演说》，希望能“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③

陈独秀认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最大危险来自日本。日俄战争后，日本就将其势力扩张至我国的东三省，1919年初，由英、法、美、意、日五强所把持的巴黎和会又强行将战败德国原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日本。这引起了陈独秀的警觉，他认为“现在还是强盗世界！”“日本侵害了我们的东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们的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把山东问题当做山东一省人的存亡问题。”^④

陈独秀认为万一“我们中国若免不得亡国的运命，宁可亡在欧美列国手里，不愿亡在日本手里”，什么联合亚洲的黄人，抵抗欧美白人的鬼话，我们绝对不相信。因为黄人待黄人，比白人待黄人还要残狠十倍。^⑤“在人类共同生

活的大义说起来，日本人若真心实行中日亲善主义，不占据中国土地，不侵害中国主权，不垄断中国的交通机关和矿山，破坏中国民族生存的基础，至于相当的工商业的和平发展，我们不但反对，并且觉得有相互的利益。”“所以我要奉劝日本国民，若求日本民族在中国真实的稳健的发展，应当用和平的工商主义，不应当用强迫的侵略主义。”^⑥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积极主张抗日，以托派中央的名义起草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在托派刊物《火花》、《校内生活》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抗日。为了扩大影响，他于1931年12月5日又创办了自任主编的《热潮》周刊，作为宣传抗日的阵地。陈独秀公开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英美等国操纵国联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阴谋，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主张武装抗日，抵制日货，对日绝交；抨击蒋介石对日妥协、出卖民族利益比袁世凯更甚，号召抗日反蒋。1932年10月国民党以“危害民国”及“叛国”罪将陈独秀逮捕入狱。在法庭上，陈独秀申述反对国民党的三个理由：一是人民不自由，二是贪官污吏横行，三是政府不能彻底抗日。在自撰数千言的《辩诉状》中，陈独秀猛烈抨击国民党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国民党竭全国人力膏脂以养兵，拥全国军队以搜刮人民杀戮异己，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无诚意抵抗。”^⑦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释放全部政治犯”的要求下，

①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7页。

② 陈独秀：《扬子江形势论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③ 陈独秀：《安徽爱国会演说》，《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④⑥ 陈独秀：《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8~99、99页。

⑤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⑦ 陈独秀：《辩诉状》，《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陈独秀被释放出狱。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建立之时，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都纷纷提出各自抗日救国的主张。这种局势对一向关心抗战的陈独秀产生了深刻影响，何去何从，他面临着新的抉择。陈独秀出狱后，各种政治势力都想拉拢他，胡适邀他去美国写自传，后又拉他进“国防参议会”，都被拒绝。“八一三”淞沪抗战，国民党政府表现出了坚定的抗日态度与决心，陈独秀摒弃前嫌，转而拥护曾经关押过自己的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他先后在南京、武汉多次发表演说，撰写文章，积极宣传抗战，表示拥护抗战。1937年10月6日，陈独秀在武昌华中大学就“抗日战争之意义”发表演讲，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为什么要抗战？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日本欺压我们太厉害。这话固然不错，可是，未免过于肤浅了，一般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明瞭更深一点的意义，抗战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而有深长的历史意义。”“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首先必须深刻的了解抗战之真实意义，才会有始终坚决不挠的意志。”“此次抗日战争，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也不是由于民族的复仇，更不是为了正义、人道、和平，这些好听的空洞名词，而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陈独秀还从近代中国的民族解放和近代化的过程来分析和看待此次抗日战争，认为这次抗日战争是从经济上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实现中国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的关键。他认为“此次对日战争，乃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第一次李鸿章改革，第二次戊戌维新，第三次辛亥革命，第四次北伐运动，今日的抗战乃是第五次，到了对帝国主义武装冲突阶段，也就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尖锐阶段。”他指出：此次“战争之历史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之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①

抗战时期，陈独秀不仅满腔热情地宣传抗战，呼吁“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抗战到底”，而且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充满信心。这

种乐观态度，我们从陈独秀当年很多演讲的标题中就能十分强烈地感受到，诸如“抗战到底”，“为自由而战”，“我们断然有救”，“打倒消极先生”，“言和即汉奸”，“准备战败后的对日作战”等等。陈独秀认为中国抗战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在于我们“明知必败而战！”陈独秀凭借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来面对当时国破家亡的现实，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几千年绵延不息的民族文化在生与死的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种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所迸发的最具韧性的生命之光。陈独秀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我对于此次抗日战争，也作如是观。”^②陈独秀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和人生信念来看待这场战争的前途，他坚信这场置中国于死地的战争最终会激发出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精神，“所以中国对日抗战，并不止是要收复失地，而是要争取整个的民族自由。”如果中国一天不得自由，就要抗战一天，决不中途妥协。陈独秀认为“所谓抗战到底，不是空空洞洞的无目的而战，乃是要脱离奴隶的地位，得到真正自由独立的地位”。^③

三、启蒙性：认为国家应为人民谋福利，否定“政府即国家”观念

陈独秀是一位有着深厚民族情感的爱国者，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探索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为“五四”以来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他始终严格区分“国家”和“政府”这两个不同政治实体和概念，用以反对国民政府的误国政策和专制统治。可以说，陈独秀的

①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180页。

② 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页。

③ 陈独秀：《为自由而战》，《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

一生是爱国而不爱政府的一生。陈独秀的爱国思想是理性而深刻的，他对国家和政府关系的认识体现了一个民主主义者对民生的关切。

陈独秀不仅认识到朝廷与国家的不同，国家与政府的区别，而且还从学理上系统阐述了应该不应该爱国以及爱什么样的国的问题。他认为“惟中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①“我们中华民族，自古闭关，独霸东洋，和欧美日本通商立约以前，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爱国思想，在我们普遍的国民性上，印象十分浅薄。”其实，“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因此，“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②

陈独秀之所以要强调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都执行对外妥协和对内镇压的误国政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陈独秀认为“曹、陆、章等亲日派固然有相当的罪恶，但是他们不过是造成罪恶的一种机械。”“国民发挥爱国心做政府的后援，这是国家的最大幸事。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或者可以唤起列国的同情帮我们说点公道话。人心已死的中国，国民向来没有团结一致的爱国心，这是外国人顶看不起中国人的地方，这是中国顶可伤心的现象。现在可怜只有一部分学生团体，稍微发出一点人心还未死尽的一线生机。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他斩尽杀绝，说他们不应该干涉政治，把他们送交法庭讯办。象这样办法，是要中国人心死尽，是要国民没丝毫爱国心，是要无论外国怎样欺压中国，政府外交无论怎样失败，国民都应当哑口无言。”他气愤地指出，为了“山东问题”国民集会抗议日本的欺压行为，“做政府的后盾，政府却拿武力来殴逐国民，不许集会，满街军警，断绝交通，好象对敌开战一般。

日本人看了岂不活活笑死！”^③陈独秀认为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是政府的误国政策，因此，民众反对政府的误国政策与其爱国思想和行为是并行不悖的。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2年以所谓“危害民国”和“叛国”罪起诉陈独秀。为此，陈独秀在《辩诉状》中对“政府即国家”观念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和讽刺，“民国者何？民主共和国之谓也，亦即别于君主专制之称。”“‘危害民国’者何？共和政府剥夺人民之自由，剥夺人民之参政权，乃由共和到帝制之先声，罗马历史，十九世纪法兰西及中华民国初年的历史均遗同样教训于吾人。”“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摒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的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一非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日本侵占东北，国民党不抵抗，“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毁人民组织，钳制人民口舌，使之‘镇静’，使之‘沉着应付’，即使之驯羊般在国民党指挥之下，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解放战争，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④陈独秀运用西方的启蒙思想和国家学说，对国民党政府无视国家利益的误国政策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这对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所宣传的“朕即国家”、“朝廷即国家”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颠覆。

陈独秀以人民有无独立自由人格作为区分

①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② 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115页。

③ 陈独秀：《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97页。

④ 陈独秀：《辩诉状》，《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63页。

封建专制国家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标准。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只有少数君主与贵族有独立自由的人格，大多数人民则毫无权利自由可言，他们附属于特权者。陈独秀宣称这种国家是执政者的私产，以执政者为主人，以人民为奴隶，是“伪国家”。而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人民权力，载在宪章，国家被看作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这种国家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者为公仆，是民主国家，是“真国家”。早在17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就在《政府论》中指出：“在参加政治社会时，人们主动放弃了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所享有的平等、自由和执行力，把它们交给政治社会，……这一切，都只是出于各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身及自己的自由和财产的动机。不可想象，一个有理性的动物改变他的现有状态，是为了比现在生活得更差。”“这一切不为别的，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①在这里，陈独秀实际上是用中国式的话语宣传了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所提倡的基本价值观，他认为“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全体国民之权利也。伪国家者，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利，以奉一人也”。他说：“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②陈独秀认为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重在平等精神，一个重在尊卑

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③而且，民主共和国家注重法治，可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殊。”^④陈独秀认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⑤陈独秀断言：“愚固迷信共和，以为政治之极则。政治之有共和，学术之有科学，乃近代文明之二大鸿宝也。”^⑥由此可见，陈独秀之所以提倡民主共和，反对专制独裁，并从学理上严格区分“国家”与“政府”这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和概念，是源于他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恪守。

本文作者：安庆师范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赵俊

① 约翰·洛克：《政府论》，刘晓根编译，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116页。

②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③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4页。

④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0页。

⑤ 陈独秀：《袁世凯复活》，《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页。

⑥ 陈独秀：《时局杂感》，《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2页。

Probe into Chen Duxiu's Thoughts on National State

Dong Genming

Abstract: As a Chinese famous thinker of the modern times, Chen Duxiu's thoughts on the national state are advancing, far-reaching, and enlightening. Chen Duxiu has his own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onal relationship, the nation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government. He advocates that all people within the state are equal, and never turns down the Man nationality; he looks out the "Japanese invasion", and confirms the confidence of the victory in Anti-Japanese War. He thinks that the state should make benefits for the people, and denies the idea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he state".

Key words: Chen Duxiu; nationality; state; thoughts